

《東華漢學》第 16 期；219-252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2 年 12 月

文章關乎經術 ——譚獻筆下的駢散之爭

蔡長林*

【摘要】

本文旨在釐析譚獻對駢散文之態度，以及其態度背後之學術主張。按論文主駢散不分，實為晚清文章家之主調，亦如論學而主漢宋調合一般。然不論是論學的漢宋調合抑或者論文的駢散不分，都只是一個籠統的概念而已。其間之細微變化，還有待從對學者論說的具體分疏中，一一爬梳。與譚獻在學術上同漢學家爭學統，而另立漢學譜系相對應的是，譚獻在文章上的駢散不分，亦有與古文家爭文統之意識存焉。雖然乾嘉前輩在理論上為駢文的獨立性開闢道路，但譚獻在文章的態度上反而近於古文家，認為文章要有載道之功能。只不過譚獻心中之道，是西漢經學的大典禮大制作，而不是宋明理學家言心言性之道；譚獻心中之文，是西漢文章的駢散不分，而不是韓愈以下的散行單體。在他看來，文章與經術互為表裏，文章之優劣即為學術之優劣。譚氏既以西漢駢散不分之經術文章為極則，對於後世為文能秉此道者，乃不吝褒美；而於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違反此道者，則屢有微辭。此譚獻論文之大觀，而文章所以關乎經術者以此。

關鍵詞：譚獻、駢文、散文、文章、經術

一、前言

對身處在道問學之運極盛時代的晚清士大夫而言，擁有廣博多方的學術知識，其實是很普遍的現象。與今日從事專門學問的我們，存在著視野上的極大差距。以本文的研究對象譚獻來說，若按照現代學術分類來分，他的學問至少涵蓋了經學、文學與小學。若再細分的話，則是譚獻具有經學家的素養，學術史的視野，文字學的專業，目錄本校勘學的特長。他是詞家，是詩人，同時也是詞學家、文章家與學術史專家。擅長者除了眾所周知的詞學批評之外，學術批評與文章批評亦有其獨到之處。另外，因為撰寫的對象與心境的不同，分別展現在《復堂文集》與《復堂日記》裏的譚獻文章，既富麗典雅，又婉約清新，亦頗值一觀。但是，除了譚獻的詞學理論較為世人所關注之外，能指出譚獻的文學成就與文章批評特色者，就罕見了。至於譚獻在經學史、學術史與小學校讎之學的成就及其學術意義，就識者寥寥了。鄙意以為，這種對譚獻諸多學問理解的不對稱情況，除了因為其詞學理論的突出所產生遮蔽效應之外，也與譚獻的學術批評視野處於非主流地位，不被相關學者所重視大有關聯。另外，科舉時代結束之後，對文章之學，尤其是對駢文相關討論的逐漸冷卻，也當是譚獻的文章批評乏人問津的重要原因。當然，傳統學者兼綜文史的學問素養，經過講究專門的現代學術體系分割之後，學者倚樹而不見林，自然就很難對自身專業之外的知識產生興趣或敏感度，而這也是當前學術研究亟待突破的一環。

這篇小文章當然無法涵蓋譚獻學術涉及之範圍，只能就譚獻在經學與文學立場相通之處，探討譚獻的文章觀念及其對駢散的態度，爬梳蘊涵於此間的文章與經術相關涉的學術視野及其內容。傳世文獻與先行的研究顯示，譚獻論文主駢散不分，此在當世似非特殊之論。因為就清代駢文理論的發展來看，從康乾以來為駢文爭平等，歷經以駢文為正宗的

乾嘉之際，到道咸以後的不分駢散，都不是孤立的現象，而是群體的作為。那麼譚獻論文章主駢散不分的特殊性究竟何在？有何區別於文章學視野的學術史意義？這必須要從他對文章的態度來談。基本上，立足於風格或技巧上來為駢散分高下，並非譚獻文章觀念的價值核心，一如譚獻之論詞主寄托，他強調文章背後要寓載有風雅之思與聖王之道。確切的說，譚獻重視的是經學興盛時代的大制作大典禮，而不是經宋人演繹後言心言性的載道之說。進一步來看，譚獻論文，還寓有一層由文章以觀學術之盛衰的企圖在裏面，盛者漢代經術文章，衰者宋人義理空言。既然，文章是學術之載體，則在譚獻看來，文章不只是文章，也是學術。同時，學術之良窳，也要由其載體——即文章之高下覘之。譚獻既以為學術興盛者在兩漢，而表現當時學術之文章又普遍有駢散不分的特性，則譚獻論文所以主張駢散不分，並不是從文章入手而是從學術論之。正是基於此一認識，對於後世論文章而必欲區分駢散高下，譚獻頗不以為然，認為是本末倒置。學者論撰為文，首當用其心力之處，既是西漢經術，也是駢散不分的西漢文章。只不過譚獻因為鄙棄宋學之故，論文最詆義理價值淵源於宋儒的桐城派；又因為清代駢文與經學的密切關係，以故譚獻在對駢散的實際批評上，乃前者多褒而後者多貶。此一態度，與其論文章主駢散不分之立場稍有出入，其故在譚獻的文章態度由其學術價值觀主導之故。換言之。其批評的立足點，並非單純從文體演變的角度，為六朝儷體爭取在文統上的地位，更多的心力是對韓愈以下的古文主張反其道而行，乃為兩漢經學爭道統之地位。所以，與其為清代學術重立系譜相對應的是，譚獻的反對桐城文統，亦有為清代駢文建立文章正宗系譜的企圖在內。¹概言之，譚獻的文章觀依舊是圍繞著漢學與宋學之爭場，只不過在主張駢散不分的大原則下，對乾嘉時代以駢儷之體展現經術的經師之文，有其偏好，使得其駢散不分的主張，與實際批評

¹ 關於這方面的討論，請參蔡長林，〈文人的學術參與——《復堂日記》所見譚獻的學術評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0期（2012.03），頁129-176。

之間，稍有落差而已。至於文章引經據典，以增辭藻以助文氣，則非所關乎譚氏所謂文章與經術交涉之事。

二、譚獻的文章觀念

自六朝興起的文筆之辨以來，文章與非文章之別，隨著文體發展與文章意識的抬頭，有集中在駢、散對立之趨勢。然源其初始，不過欲對雜文與美文做出區隔而已。劉勰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²梁昭明太子蕭統主編《文選》，原則是選「文」不選「筆」。在蕭統〈文選序〉中列出幾項原則：（一）《文選》不選經書，因為經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是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不可「重以芟夷，加以剪截」。（二）《文選》不選子書，是因為子書「以立意為宗」，旨在闡發作者的見解，而「不以能文為本」；（三）不選史書，是因為「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史書經由對史實的記述表達作者的歷史觀和是非原則，仍以見識為本。然而純文學的特徵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即注重辭章之美。所以，「文」的核心文體是詩，其次是辭藻華麗、聲律和諧的楚辭、漢賦和勉強列為文的六朝駢體。這種「有韻為文，無韻為筆」的概念，頗為劉勰、顏延之、蕭繹諸人所主張。如顏延之即從四部分立的角度立論，認為既然經、史、子、集已經分部，那麼討論集部的「文」不選「筆」時，可以不涉及經典。

雖然「文」、「筆」之辨在六朝以後沉寂千年，但是這樣的一種立場與態度，在清中葉漢學家身上，得到了理論上的完整闡發，並且將批評的焦點集中在韓愈以下的古文派別上。如凌廷堪云：

² 劉勰，《文心雕龍·總術》（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頁9。

蓋昌黎之文，化偶為奇，戛戛獨造，特以矯枉於一時耳，故好奇者皆尚之；然謂為文章之別派則可，謂為文章之正宗則不可。³

又說：

今年在揚州，見汪君容甫，研經論古，偶及篇章。汪君則以為《周官》、《左傳》本是經典，馬《史》班《書》亦歸載記，孟、荀之著述迥異於鴻篇，賈、孔之義疏不同於勝藻。所謂文者，屈宋之徒，爰肇其始；馬揚崔蔡，實乘其緒；建安而後，流風大倡；太清以前，正聲未泯。是故蕭統一序，已得其要領；劉勰數篇，尤徵夫詳備。……是說也同學或疑之，廷堪則深信焉。……獨是汪君，既以蕭劉作則，而又韓柳是崇，良由識力未堅，以致游移莫定。⁴

文中明白表示汪中受了蕭統和劉勰的影響，以沉思翰藻為文，有別於韓愈文起八代之衰，續孔孟以接道統，而是列屈宋至劉勰為懸鵠，然後將經史子排除在文學之外的觀點。凌廷堪自己不僅贊同，而且還責備汪中理論和實踐自相矛盾，在蕭劉、韓柳間徘徊不定。凌廷堪同時也非常贊同孔廣森以「荀卿為儒宗老師，蕭統乃文章正派」⁵的觀點，所以鈕樹玉評論凌廷堪的學術文章立場，乃言：「其學以禮經為主，謂聖門之學，無逾於此，故伸荀而抑孟，掙擊宋儒，不餘遺力。其論文以騷、賦、駢體為主，韓、柳、歐、蘇悉在指斥，餘無論矣。」⁶這種將學問獨立於事功之外，作客觀化之追求的觀點在極大的程度上影響了阮元。

在嘉、道之際，阮元張揚駢文地位，以之為文章正統，甚至較凌廷堪更進一步，直接將古文排斥在「文」之外，否定韓愈古文為「文」之別派的思想，其理論主要體現在〈文言說〉、〈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與友人論古文書〉、〈四六叢話序〉和〈文韻說〉上。例如在〈與友

³ 凌廷堪，〈書唐文粹後〉，《校禮堂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卷 32，頁 6b。

⁴ 凌廷堪，〈上洗馬翁覃溪師書〉，《校禮堂集》，卷 22，頁 10a-10b。

⁵ 凌廷堪，〈孔檢討誄並序〉，《校禮堂集》，卷 36，頁 2b。

⁶ 鈕樹玉，〈書凌次仲校禮堂文集後〉，《非石日記鈔》（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頁 18。

人論古文書》中，阮元即高揚〈文選序〉沉思翰藻的選文標準。他說：「〈選序〉之法，於經子史三家不加甄錄，為其以立意紀事為本，非沉思翰藻之比也。今之為古文者，以彼所棄，為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紀事，是乃子史之正流，終與文章有別。」⁷在〈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後又言：「專名為文，必沉思翰藻而後可也。……然則今人所謂之古文，當名之為何？曰：凡說經講學皆經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立意為宗皆子派也，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為文也。非文者尚不可名之為文，況名之曰古文乎？」⁸強調沉思翰藻才名為「文」，重申經子史都不可專名為「文」。然若參之以阮元的〈文言說〉與〈文韻說〉，我們可以發現，阮元對「文」的定義其實較為狹隘，主要是為對治古文而專門為駢文立論。如言：

為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記易誦，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字字用韻。……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之人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⁹

按阮言據〈文言〉發論，從中演繹出為文兩大要素，即音韻相和與句式對偶。至於單行之語，乃直言之言，論難之語，與「文」無涉，更非「古文」。如此論述，有形式主義的傾向，此蓋與其專注於論述駢文為「文」有大關係。其實，按照「有韻為文，無韻為筆」的標準言之，駢文理應列入筆之列。¹⁰為此，阮元子阮福針對《文選》中文章不押韻者提出質疑。阮元乃特撰〈文韻說〉解其疑：

⁷ 阮元，〈與友人論古文書〉，《擘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609-610。

⁸ 阮元，〈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擘經室集》，頁 608。

⁹ 阮元，〈文言說〉，《擘經室集》，頁 605-606。

¹⁰ 按：六朝文筆說的本意，並未包含阮元所謂的駢、散之分。章太炎即指出

曰：梁時恆言所謂韻者，固指押韻，亦兼謂章句中之音韻，即古人所言之宮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福曰：唐人四六之平仄，似非所論於梁以前。曰：此不然。八代不押韻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頓挫抑揚，咏嘆聲情，皆有合乎音韻宮羽者，《詩》、《騷》而後，莫不皆然。而沈約矜為創獲，固於〈謝靈運傳〉論曰：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休文此說，乃指各文章句之內有音韻宮羽而言，非謂句末之押韻腳也。是以聲韻流變而成四六，亦只論章句中之平仄，不復有押韻腳也，四六乃有韻文之極致，不得謂之為無韻之文也。¹¹

阮元試圖向其子解釋，文章中有韻不僅指押韻腳，還指章句中的平仄搭配。所謂宮羽相變、低昂舛節、浮聲切響、前乎後應等聲調原則，皆是有韻之明徵，亦是《文選》選文的標準，而不必僅是押韻腳謂之文。阮元之說，得到其弟子門生及後學的擁護，從道光間的梁章鉅，到晚清劉師培、李詳、黃侃，皆主其說。如劉師培即云：「偶語韻詞謂之文，凡非偶語韻詞概謂之筆。蓋文以韻詞為主，無韻而偶，亦得稱文。」¹²就是阮元之說的沿續。

必須指出的是，阮元關於文章的諸多論述，除了以文、筆分駢散，窄化了文章的範圍之外，阮元張揚駢文之態度，不只是和古文家對立，同時將經史子排除在文學之外的觀點，也與當時的學術氛圍異趣，體現出其立基於學術分類論述所欲建立獨立知識的特殊語境。¹³

六朝任昉、徐陵善儷語，乃當時駢文大家，然時人稱任、徐之文為「筆」，顯然與阮元的標準有異。郭紹虞亦指出：「在南朝，文是文筆或詩筆的共名，即押韻者為文，不押韻者為筆。而當時不押韻腳的駢文實為筆而非文，阮元對文筆的解釋不免流於穿鑿附會。」章太炎：〈文學總略〉，收入《國故論衡》（臺北：廣文書局，1977），頁43；郭紹虞：〈文筆與詩筆〉，收入《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166。

¹¹ 阮元，〈文韻說〉，《擘經室集》，頁1065-1066。

¹² 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收入《劉申叔遺書》（臺北：華世出版社，1975）冊1，頁36。

¹³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阮元學圈是一個有見地而又特殊的群體。他們的特殊之處，不在於治學方法的殊異性，而是學術意識的現代性。簡言之，即

換言之，以六經為文章淵藪，是傳統士大夫根深蒂固的觀念。若發為文章而可以置經典於不顧，容易發生迷失根本、斷港絕潢的錯誤。更何況乾嘉時代的經生史家，更多的是持六經皆文、子史亦文之主張。甚至可以這樣認為，駢文的興盛，與持漢學立場的經學家大量創作，有密切的關係。例如吳鼐論評其老師吳錫麒：「先生各體文皆工，而於駢體致力尤深。……先生不務奇，不恃博，詞必澤於經史，體必準於古初。」¹⁴又如清末賀贊元序其師皮錫瑞文集云：「國朝儒風卓創，經義麗天，諸師授義，步擬漢家。士之談經者，咸尚藻儷。故說解樸實，文亦茂美。」¹⁵又如徐運錦所言：「國朝右文越古，雅化作人。大可豔發於蕭山，竹侏鷹揚於秀水，巽軒儀鄭，煥乎有文；稚存卷施，卓而大雅。類皆探真源於經藝，辟康莊於詞林。萃案斷之專家，續往籍之絕學。」¹⁶此處以毛奇齡、朱彝尊、孔廣森、洪亮吉為例，指出清朝經學家以駢文潤色鴻業的學術史實。有學者認為，乾嘉文壇關於文章的紛爭，為駢文創作和理論的發展提供了機會。大膽地說，乾嘉駢文形成了以沉絕博麗為自己獨特的審美追求，正是漢學家的博學和駢文家的麗辭分別在反抗道統和文統中走向融合的產物。乾嘉漢學家多為駢文家，而道學家多為古文家，就是最有力的證明。¹⁷所以，從學術史的視野來考察阮元的駢文論述，我們或可以這樣認為：在與將道統文統相結合的古文體系對抗中，阮元

是對學術本身的價值有所認知並且有了自覺獨立的要求。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突出駢文地位，對唐宋八大家載道之說的反省，皆意在使文學不再附屬於其他知識之下，抑或負擔社會教化的現實功能。天道天理的形上義交付子學，社會教化則交付經學或史學，文學則以麗乎日月、沉思翰藻為能事，無須有其他目的。此一現代性的意識，較諸講究文學當具有實用性的清末五四諸公，可謂有過之，惜乎知己尚少。相關討論，可參呂雙偉：《清代駢文理論研究》，浙江大學中文系 2006 博士論文；邱培超：《自「文以載道」至「文道分離」——學術視域下阮元學圈的文統觀及其意義》，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2011 博士論文。

¹⁴ 吳鼐，〈有正味齋續集題詞〉，《八家四六文鈔》，卷首。

¹⁵ 賀贊元，《師伏堂駢體文二種·序》，《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 1567 冊，頁 265。

¹⁶ 徐運錦，《師伏堂駢體文二種·序》，同前註，頁 267。

¹⁷ 呂雙偉，《清代駢文理論研究》，頁 95-96。

雖確立了駢文在文統的地位，卻未相應地為駢文賦予道統的地位。這或許是他為了要替「文章」爭獨立地為而有意為之，卻不見得能被廣泛的、具有經學背景的後生學子所理解。所以，阮元外經史子於文的論說，並非清人文章觀念的主流，而有其建構學術獨立性的思維體系作用其中。

相對於阮元具有特殊性的文章理論，譚獻的文章觀念卻是保守中帶有個人特色。所謂保守者，在於譚氏論文章不脫傳統致用之目的；所謂帶有個人特色者，在於不論詩詞歌賦散文駢體，皆是文章。換言之，譚獻認為文章之所以能被視為文章，重要者不在於文章之體裁，而在於文章作為載體所承載之內容。即文章必須寄托比興，寓有微言大義，必須闡發聖人經教，尤貴能藉以感傷時事，觀風俗厚薄古今盛衰，完全是實用主義的立場。如言：

言詩之旨，推本六藝，曰溫柔敦厚，曰思無邪，所謂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持此以進退百代，即非一己之愛憎，否則刻畫唐突、應聲吠影而已。竊謂文章之品評，唐以前多公論，唐以後多私言，以由唐以來不識本原日甚一日也。¹⁸

上述論詩之原則既已體現在譚獻詞論之中，以尊詞之體為世所知，然此不過譚獻所言文章之一端耳。其能知詞論亦為譚氏文章觀念之發用，且綜括諸體而論之者，尚罕見焉。至於譚氏有「文章之品評，唐以前多公論，唐以後多私言，在於唐以來不識本原日甚一日」的論斷，有其文章流變的觀察在內，容於稍後討論之。此處所欲先論者，在於譚獻所言文章與經學之關係。今觀〈復堂文錄甲序〉所言：

大漢文章之炳焉，與三代同風，何以明之？鳳鳥不至，黑不代蒼，孔氏之門，六藝授受，《春秋》之成。……《春秋》之傳，董相始有書，賈生淵源張蒼，為《左氏》大師。類次二十四代朝野之篇章，則以董、賈為稱首。以夫經教推究世用，則二子始於是乎！百家稍息，孔氏仁義之教，《詩》、《禮》之家法，日以昭灼，且夫〈洪

¹⁸ 譚獻，《復堂日記》（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卷4，頁90。

範·五行〉，天人之故，抑亦肇於董子矣。……古者學以為治，陳言朝廷之上，莘莘大者，貫五德之運，通萬國之情，其次因事納忠，一簡有一簡之益，一篇有一篇之用，……凡以為六藝之所推也。¹⁹大漢文章，董、賈稱首，所以為歷朝之冠者，乃因推《春秋》經教以究世用，實始於二子。而孔氏仁義之教，《詩》、《禮》之家法與夫〈洪範·五行〉，天人相與之故，亦肇端於董子。然董生學以為治，能陳言廟堂，因事以納忠。後人觀其推六藝之精華，貫五德之運，通萬國之情，一簡一篇，皆有效用。此儒者之極則，實歷代所仿效。譚獻序其文集而作此言者，意在以董、賈為式，效古大臣之陳謨，立言經教，推究世用。在譚獻看來，董、賈推六藝以為經教，其實是一篇篇吐辭精彩的大文章，乃淑世之寶典，非學究之餽釘。所謂「大賢亞聖，吐辭為經」，²⁰又所謂「文章之事，知政知化」，²¹何須宮徵靡曼，五色相宣，儷句對偶，方為文章？

站在這個立場上，譚獻對歷代文章加以品評，肯否互見。其中能將經術文章相結合，發揮聖人經教的完美形式，譚獻以為體現在常州莊氏之學。來看一則《復堂日記》的記載，譚獻云：

溫燁莊先生《味經堂遺書》，復記所見。《易說》深美閎約，如加王心焉，可以當浩乎沛然矣。……《繫辭傳論》依經立誼，旁推交通，致用之學，非經生之業，誕正群言，所當者自廢。《象傳論》鬥亂不亂，有物有序，而言外之旨尤廣。《象象論》大義微言，同條共貫，而于用人之消長，宮府之舉曆，武事之張弛，仁義之本末，重言申明，若有憂者，古大臣之陳謨，豈徒儒者之著書也哉。先生之說《易》也，蓋深於《禮》、《春秋》，故典常之小大，密於康成；天人之本原，究於江都，兩漢鉅儒，殆以兼美。²²

¹⁹ 譚獻，《復堂文錄》（臺北：華文書局，1970），卷1，頁12。

²⁰ 譚獻，《復堂日記》，卷1，頁6。

²¹ 同前註，卷3，頁69。

²² 同前註，卷7，頁161-162。

按譚獻「古大臣之陳謨，豈徒儒者之著書」的贊語，可謂道盡文人糾結於經典與政治之隱衷。這是通經致用傳統下的文人治經，而非以學問為務的經生之業。所以，講究的是以深美閎約之文，發其言外之旨，然後依經立誼，旁推交通。其中大義微言，若有憂者，在於執道論政，陳謨規諫。又以深於《禮》、《春秋》之故，其論《易》乃不同宋儒性道之語，而是寓於典章以論天人之際，乃譚氏所謂「以經義治事為歸」者。²³故「于用人之消長，宮府之舉廢，武事之張弛，仁義之本末，重言申明」，是知其功能與目的，與經生章句，如日月之懸隔，有體用之殊致。故譚獻贊之曰：「密於康成，究於江都，兩漢鉅儒，殆以兼美。」由上述之言可知，譚獻推許於莊氏者，在於莊氏之經術文章乃關乎典章制度的大制作、大典禮，這是譚獻論文章優劣非常重要的依據。再舉譚氏所評莊氏《尚書》、《毛詩》、《四書說》為例。譚獻云：

《尚書說》、《毛詩說》渾粹有道之言，經師而人師矣。²⁴

《尚書既見》精深而有遠思，唐賢學漢文似未到此。……《四書說》盧牟六籍，貫串四科，不當以箋釋求之。章法完密，起伏有神，可入經師文鈔，授學子讀。²⁵

按莊綬甲言《尚書既見》三卷，皆所以明聖人之於天道，²⁶故譚氏評之以為精深而有遠思，又言唐賢學漢文似未到此者，則是以存與文章直接漢人矣。又《四書說》則廣徵兩漢載籍，專與朱子為異。²⁷文悍而肆，說理綿密。故譚獻以為章法完密，起伏有神，有別於箋釋，可入經師文鈔，為學子課業之範本。

²³ 同前註，卷1，頁6。

²⁴ 同前註，頁21。

²⁵ 同前註，卷7，頁161-162。

²⁶ 莊綬甲，〈尚書既見跋〉，《拾遺補藝齋文鈔》（道光18年李兆洛刊本），頁3-4。

²⁷ 蔣彤，〈四書說跋〉，收入莊存與《四書說》（道光18年李兆洛刊本）卷末；又明倫：〈四書說提要〉，《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961。

需要說明的是，莊氏以深沉之思，旁推交通，發為奧衍之辭，乃文人說經之極致，理當有其經學史上應有之地位。但是，以文章發揮經義，或者經學義理需由文章展現的論學立場，在經學場域應該得到的話語權利，顯然沒有受到足夠的尊重。從這個角度來看，譚獻對莊氏經說的推許，還有一層以文章論學術優劣的用意在內，而與源流深遠的文論傳統有內在的聯繫。因為在譚獻心目中，治經並非樸學之士的專利，發揮經義的文章之儒，同樣可擠於第一流之位。今觀其言曰：

閱莊方耕先生《尚書既見》，雖未決去偽古文，而文事深淳古厚，直接董、荀，猶子葆琛先生無此淵懿也。國朝諸儒，如惠氏一家、王氏一家、莊氏一家，皆第一流。²⁸

按譚獻曾謂董生可以鼎足孟、荀，又以莊存與文事深淳古厚，直接董、荀，則是不與並世儒者比肩矣。此蓋以身兼孟、荀之傳道，與夫董、賈文章視存與，可謂對儒者傳經最高之禮贊，至於辨古籍真偽，乃為之術淺且近者也，²⁹此經生事業，非通儒所應為。然胡玉縉乃謂：「譚獻《復堂日記》乃以為國朝第一流，謂『雖未決去偽古文，而文字深醇古厚，直接董、荀』。譚氏固不知經學者，故僅論其文章也。」³⁰胡氏所言經學，仍不脫考據間架，故有是論。其間不必真有是非，端在學者如何認定經學耳。

除了譚獻所欣賞的常州學者之外，譚獻對漢學家之文章，亦有不少評論，而且褒多貶少。如評「竹汀先生（錢大昕），樸學之桀，辭達而溫」，³¹稱陳鱣《簡莊文鈔》「樸至溫潤，經生善士之文」。³²又評王昶《湖海文傳》云：

²⁸ 譚獻，《復堂日記》，卷1，頁2。

²⁹ 龔自珍，〈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142。

³⁰ 胡玉縉，〈許廣經籍題跋·經部之一·尚書既見書後〉，收入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第4卷（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頁27。

³¹ 譚獻，《復堂日記》，卷4，頁82。

³² 同前註，卷7，頁177。

閱《湖海文傳》七十五卷一過。王侍郎意在考證掌故，故文多翔實有用。說經之文，同時諸君學術已見大概，不立問架，不主流派。阮文達推為有明三百年所無，不虛也。第文多可傳，不盡可讀。欲頗欲合吳枚庵《文徵》、李邁堂《文錄》及篋衍所有諸別集，寫出一二百篇以為家塾讀本。至往日欲撰《經師十家文鈔》，則體例不必盡同。³³

作為惠棟問業弟子，王昶自有吳派典實博學之特長。故其說經之文，多考掌故，而翔實有用。阮元所推，殆亦指此。然考據家之文，旁徵博引，難免有不顧文氣之病。所以因其翔實而文多可傳，卻又因其不便朗誦而不盡可讀。譚獻欲合吳翊鳳《國朝文徵》、李祖陶《國朝文錄》以及所藏別集，錄出一二百篇以為家塾讀本，就在於經師之文可傳而不盡可讀，必須篩選之故。譚獻所言《經師十家文鈔》雖未曾問世，卻是一直有編輯經師範文的想法。如曾言：「偶思取味經（莊存與）、容甫（汪中）、巽軒（孔廣森）、實齋（章學誠）、珍藝（莊述祖）、申受（劉逢祿）、保緒（周濟）、定庵（龔自珍）諸家文錄數十篇以為讀本。」³⁴表示譚獻對清代經學家一直心存欣賞與敬意，認為是經術文章結合的典範。這一點，也可以從他對錢林《文獻徵存錄》的評論中體現出來。譚獻云：

閱《文獻徵存錄》卒業。記數行云：國朝學術精純，文章爾雅，嘉慶以前著作之林，蓋十得八九矣。循攬於是，足以識學問之原流，文藝之正變。儒者立身本末，師友規矩，歷歷可指數。儒林文苑，唐以上漢以下卓絕之賢且抗顏、且讓美。……又是書所采掇，崇獎敦樸之學，品藻柔厚之文，別白一尊，實事求是，皆可於言外得之。³⁵

譚獻總體上對有清一代學術文章頗多稱美。這一則記載，就是對嘉慶以前儒者在文章學術、師友交誼、立身行處等方面，給予一個比美漢唐前

³³ 同前註，卷5，頁121。

³⁴ 同前註，卷1，頁19。

³⁵ 譚獻，《復堂日記·補錄》，卷1，頁274。

賢的禮贊。而所言是書所采為「崇獎敦樸之學，品藻柔厚之文，別白一尊，實事求是，皆可於言外得之」者，除了推崇經術文章的完美結合之外，也稱許錢林辨章學術之功，不錄宋學性道之言，其言外之意，正所謂「足以識學問之原流，文藝之正變」也。

當然，譚獻在個別具體的學者身上，還是有褒有貶，此處舉一例以見譚獻之態度：

蕭山沈豫補堂《蛾術堂集》閱畢。幼學有文，方圓未就，說經氣平而語瑣，未見其大。群籍亦得塗徑，但識力未卓。駢偶之文，有陳隋章句，篇幅尚狹，情韻差短。詩篇婉而未深，文士之抱樸者，鮮濯磨辟灌之功，實少振裘挈領之識耳。《學海堂經解淵源錄》、《經解提要》亦尚無獨至之言。全書雜題，瑣屑叢談，於著書義例尤狠率。³⁶

譚獻在這裏批評的是「文士之抱樸者」，即是誤隨風會，擁抱樸學潮流，卻又邯鄲學步，淮橘變枳之徒。譚獻分別從學識與文章功力兩方面給予嚴厲批評，所以見譚獻的批評觀，並非凡漢學皆好，凡駢偶皆美的偏至之論。

另外，譚獻除了從內容強調經典需與文章相結合之外，對於儷偶之文，亦不排斥，前提是內容要能發揮聖人經教。來看譚獻一則對徐幹的評論：

讀《中論》。偉長漢末巨儒，造就正大。微言大義，昭若發蒙。貫串群經，當與康成相揖讓。文體醇深翔實，筆兼導頓，義精單復。方之前漢，擬肖子淵。寓意托諷，如〈法象〉、〈審大臣〉、〈慎所從〉、〈知行〉、〈去偽〉諸篇。漢魏之際，上下群倫皆如燭照數計也。竟陵胡石莊《繹志》於二千年間可以濟美。張泉文先生篤嗜此書，然學之而未至。³⁷

³⁶ 同前註，卷2，頁338。

³⁷ 譚獻，《復堂日記》，卷4，頁94。

這實在是很有意思的一則評論。在西方基督教發展的歷史上，有兩位對基督教教義具有闡發之功的人物，一是奧古斯丁、一是托馬斯。擬諸東方，對儒家經典之闡釋，亦有兩位堪與比兼之人物，一是鄭玄、一是朱子。按康成以遍注群經的方式，建立兩千年來學者的治經規範，其地位之高，惟有朱子差堪可擬。徐幹若依現代的學術分類，應是作為儒家人物，列入思想史的闡釋之中。然譚獻卻認為徐幹儒業造就正大，足以揖讓康成。以其論說之中，能貫串群經，使微言大義，昭若發蒙。這實際上就是從文章演繹儒術的角度所進行的觀察，卻是自來論學術優劣者所罕見。尤其對徐幹的文章體制大加讚賞，以為能文兼駢散，有抑揚頓挫之致。又「沖和古秀，潛氣內轉，東漢人未見其偶，宜張舉文先生嘆絕倫也」。³⁸方之前漢，惟王褒可以匹敵。更重要的是，書中名篇迭出，寓意托諷，所謂「漢魏之際，上下群倫皆如燭照數計」，即在於文章中寓有風會興衰之思，此在譚獻看來，正是《詩》之延續。

譚獻既以詩歌亦為文章之一體，其著意處即在於以經教觀風會，所謂言外之旨，恍忽有物，而非糾結於詩歌音節章彩的形式之美。觀其〈明詩〉所言：

獻嘗服膺會稽章先生之言曰：詩教至廣，其用至多。而又師其論文之旨，持以論詩。求夫辭有體要，萬變而不離其宗。進退古今，以求其合，蓋千一而紬。然而一代政教、一時風尚，則可以觀焉。世盛則草野皆和平之音，世亂則衣冠皆嗷殺之音。流連風月，奔走聲氣，雖甚齷齪，而可覘靈長；悲悼感憤，窮蹙酸嘶，雖甚迫狹，而可識兵凶。嚴刑峻法，世變日亟，則群樂放廢，家家自以為老莊；放僻邪侈，名實不副，而不恥干進，人人自以為屈賈。之數者，幾相感召，如環無端，無病而呻，與樂憂者，非人情耳。按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篇謂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多出於《詩》教，其故在於戰國行人之官，演繹春秋大夫之聘問，由賦詩一變

³⁸ 同前註，卷1，頁6。

為敷張揚厲之辭章。而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者，乃因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故論文之旨亦可以言詩，乃因有其前後相承之關係，是皆文章也，譚獻蓋有取乎此。然文章求其體要，在萬變不離其宗。亦即不論形式如何變化，內容所載，仍是一代政教、一時風尚，而後可從中觀其風會，識其盛衰，可謂皆有與乎世運也，而所謂「世盛則草野皆和平之音，世亂則衣冠皆嗷殺之音」者以此。所以流連風月之鄙辭，可以覘性靈之寡長；悲悼窮蹙之嘶吼，可以識兵凶之迫狹。而嚴刑峻法之治，放僻邪侈之時，各有其特殊之顯相，皆所以為觀風會盛衰之所資。由是文章之業，非僅關乎詩之靡麗，非徒與於文之排比，而在於求其體要，寓盛衰於幾微之際。譚獻所謂「詩可以觀化者」³⁹以此。這樣的觀念，在譚獻的文集中，普遍存在著。例如在〈學宛堂詩序〉中，譚獻對此有更深入的論述。其言云：

蓋嘗論之，《樂經》亡而聲音之理微，而其道猶未至於滅熄者，則《詩》尚焉。孔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雅頌闕壞，宮商廢失，而上之德意無以宣，下之民隱無以達，猶賴賢人君子，負述作之才，稱心而言。世治則可以歌詠功德，揚盛烈於無窮；世亂則又託微物以極時變，諷諭政教之失得。綢繆婉篤於倫理之中，遇之如近而尋之實深，此誠足以通《春秋》之教者也。往讀宛鄰書屋《古詩錄》，去取乎雅正，揚托乎興觀，得詩人之遺意，而有裨於聲音之道。⁴⁰

按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所以思維繫政教於不墜者。後世雖雅頌闕壞，宮商廢失，使上德無以宣，下隱無以達，然猶有賢人君子，懷抱述作之意，敘其心聲。或歌詠功德，揚其盛烈；或託微極變，諷頌得失，雖是儒者之恆言，卻又意義深遠，誠足以通《春秋》之教，亦譚氏詩可以觀化、文章可以觀風會之意。至於學術倚伏之理，與詩之觀化、文章之觀風會，似二而實一，可以相通也，以下論之。

³⁹ 譚獻，《復堂文錄》，卷1，頁23-24。

⁴⁰ 同前註，頁22-23。

三、譚獻的駢散論述

譚獻在文章論述上最大的特點，大概就是駢散不分，這不但是就創作的角度而言，也是就批評的角度而言。按譚獻以流略論文章，有漢魏優於六朝，六朝優於隋唐，隋唐優於兩宋元明，自韓愈以下，直至清代前期，文章之事，萎頓於草野，直至乾嘉諸儒，能將文章與經術緊密結合，文章之事才復振作的看法。這是因為譚獻不單只就文章的技巧聲色為之品評而已，在對駢散分合的評論中，還潛藏著以文章論學術的意識在內。所以，譚獻對文章的優劣之評，同時也就是對學術的優劣之評。但是，何謂駢散不分，又為何主駢散不分，有無譚獻自己的特殊語境？這需要從譚獻與《駢體文鈔》的關係來談。

譚獻非常欣賞李兆洛所編的《駢體文鈔》，一生誦讀不輟，一再校閱，並且數度批注，為之刊刻。按嘉慶二十五年（1820），李兆洛為康紹鏞校刻《古文辭類纂》，道光元年（1821），《駢體文鈔》刊刻行世。李兆洛刊刻《駢體文鈔》的用意，主要是針對當時文壇上卑駢尊散的觀念提出駁議，希望透過文章選本的方式來呈現古人文章不分駢散，乃至駢散同源的事實，所以《駢體文鈔》之刻，有與《古文辭類纂》爭文章正脈之意味。事實上在今天看來，李兆洛所選的許多文章，並不是駢文，而是雜有駢行儷句的散文，李兆洛自己也明白，但他就是意在從選文中呈現出駢散從兼容到分離的過程，以證明文章初始的狀態，不是後世古文家所宣示的樣子。由於《駢體文鈔》收錄了李斯〈諫逐客書〉、司馬遷〈報任安書〉、諸葛亮〈出師表〉等以散行為主的文章，所以當李兆洛請好友莊綬甲為之序時，莊綬甲婉拒之，並提出質疑。李兆洛解釋云：

若以〈報任安〉等書不當入，則豈惟此二篇？自晉以前皆不宜入也。如此則《四六法海》等選本足矣，何事洛之為喙喙乎？洛之意，頗不滿於今之古文家，但言宗唐宋，而不敢言宗兩漢。……

竊以為後人欲宗兩漢，非自駢體入不可。……竊不欲人避駢體之名，故因流以溯其源，豈弟屈司馬、諸葛以為駢耳。將推而至《老子》、《管子》、《韓非子》等，皆駢之也。今試指《老子》、《管子》謂駢，人必不能辭也。而乃欲為司馬、諸葛避駢之名哉？〈報任安書〉，謝朓、江淹諸書之藍本也；〈出師表〉，晉宋諸奏疏之藍本也。皆從流溯源之所不能不及焉者也。其餘所收秦漢諸文大率皆如此，可篇篇以此意求之者也。⁴¹

李氏在信中，對當時只敢言宗唐宋而不敢言宗兩漢的文壇風氣，表示不滿之意。所以刻意強調駢體淵源於秦漢文章，並且從實際選文中表達他的理念。這樣做，既有抬高六朝駢文地位之用意，更重要的是，他想要藉以證明駢文與古文本就屬於近親關係，後人不應厚此薄彼。李氏並在文中指出，若依嚴格的文體形式為標準，則不僅〈報任安〉等書不當入駢體文，即晉代以前的文章都不能列為駢文，但這樣的形式主義，並無助於理解文章之源流正變，更不能打破唐宋派古文家散體為宗的偏見。若拔高一步，論文而宗兩漢，則上下求索，於先秦、於六朝就有連貫之致，因為秦漢之文，是許多六朝文章模仿的對象，所以選錄駢體文，就應該選取六朝淵源所自的秦漢文，而秦漢文皆駢散不分也。正如李兆洛自己所言：「文之體，至六代而其變盡矣。沿其流，極而溯之，以至乎其源，則其所出者一也。」⁴²當然，這樣的選文態度，不僅止是欲為駢文溯源而已，依其駢散同源之論述，亦可謂為古文溯其源也。故李氏弟子薛子衡即謂：「當世皆知，是編可以正駢體之軌轍，而先生實欲以溯古文之原始也。」⁴³

從譚獻的角度來看，他首先有取於《駢體文鈔》的，是將李兆洛文章宗兩漢的觀點，轉化成兩漢文章優於六朝、隋唐的觀點。而兩漢文章

⁴¹ 李兆洛，〈答莊卿珊書〉，《養一齋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8，頁6b。

⁴² 李兆洛，〈駢體文鈔序〉，《養一齋文集》，卷5，頁8b。

⁴³ 薛子衡，〈李養一先生行狀〉，《養一齋文集》，卷首，頁3a。

的優勢在於內容上，能與經學緊密結合；在章法上，又能樸素而嚴密。所以，譚獻雖然在創作上以駢文呈現，在感情上也傾向駢文而諷刺古文，但是在批評上，他對文章在漢末六朝的駢麗傾向，仍有微辭，而這就是譚獻論文章主張不分駢散的意義。換個角度講，不分駢散者，在意主兩漢也。更何況譚獻在學術立場上，對漢學，尤其是西漢之學極盡傾慕之意，東漢以下，則每有批駁，所以觀其文章論述，有與其學術傾向合拍之勢。譚獻關於駢散的言論，主要體現在對《駢體文鈔》的評點，以及《復堂日記》之中，分別代表了譚獻對漢魏六朝以及唐宋至清代駢散文章的評價，以下依序錄出。

例如譚獻在〈王子陽諫昌邑王書〉之下評之曰：「門庭廊廡，自成一代之文，經生陳言，閱約有體。」又曰：「下開匡、劉。」⁴⁴於〈劉子政上災異封事〉下評之曰：「章法之完密，提掇起伏之明畫，往古未有，來者莫繼。」⁴⁵「其氣之厚，後人無及者。」⁴⁵於〈匡穉圭上政治得失疏〉下評之曰：「納誨之體，無矜情無溢詞，何其坦夷。然過折，尚非東京諸賢所及。」又曰：「匡穉圭深於禮，故其辭尤粹美。」又曰：「三代臣工，因事納忠，無覩縷雜陳者。」⁴⁶於〈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下評之曰：「風骨學於諸子，華實化於騷賦。譬之拳勇，純以筋節運神氣，不露聲色，所以為高。」⁴⁷於〈王子淵四子講德論〉之下評曰：「張宛麟（張琦，惠言之弟）云：往時讀此文，病其氣靡辭冗，今再讀之，始知其氣之淳厚，辭之腴暢，從容雅、頌，令人漸漬其中而不能自己。」又云：「此評與此文同不朽，皋文（惠言）喜《中論》亦是此意。」⁴⁸於〈揚子雲十二州箴〉下評之曰：「子雲諸箴，質多於文，源出於《詩》、《書》者也。〈本傳〉以為法〈虞箴〉而推究盛衰，折衷經訓，才學識

⁴⁴ 李兆洛編，譚獻評，《駢體文鈔》（臺北：世界書局，1956），卷11，頁8。

⁴⁵ 同前註，卷11，頁9。

⁴⁶ 同前註，頁13。

⁴⁷ 同前註，卷3，頁1。

⁴⁸ 同前註，頁12。

具備。」⁴⁹於〈揚子雲諫不受單于朝書〉下評之曰：「西京之末，復見盛漢之閎壯者，子雲之文也。」「亦英亦雄亦奇亦正，此與〈諫獵〉可並美〈卿雲〉、〈黼黻〉，所謂三代同風者也。」⁵⁰以上所評，皆西漢文章，而美以經訓，褒以樸至，而為譚獻評論歷代文章之標準。

又譚獻於〈班孟堅典引〉之下評曰：「辭義不能出馬、揚之外，琢句益巧，結體益順，摹寫馬、揚處有痕。」「裁密思靡，遂為駢體科律。語無歸宿，閱之覺茫無畔岸。此其所以不逮〈卿雲〉。」⁵¹則是譚獻論文以為東漢之孟堅不逮西漢之馬、揚，而歸咎於駢體之起，班固為階之厲。又於〈班孟堅竇車騎北伐頌〉之下評曰：「語奇句重，下開昌黎。」則又以其語奇句重之法，為韓愈所倣。又曰：「但頌車騎之功，而不歸美命將之人，殊失立言之體，宜昭明之不錄也。」⁵²則是諷其立言之體，輕重有誤。又〈高堂升平諫明帝疏〉之下評曰：「說理如家人，使筆如風雨。漢代質樸之體稍變，而情辭曲暢，拔奇於仲宣、子建之外。」⁵³雖有美評，然亦點出文章變化之幾微。又於〈劉子奇上桓帝書〉之下評曰：「迫切之至，亦祖伊、微子之旨。伉直動盪，骨氣奇高，而華詞已開晉宋文章氣運，作者亦不自知。」⁵⁴所述之理，一如其上。至於〈高伯恭北伐頌〉之下評曰：「格高而氣卑，意厚而語薄，時為之也。然以視齊梁繁響，則此固為雅奏。」⁵⁵則是認為東漢文章雖氣卑語薄，還不至於如齊梁繁響。於〈鮑明遠河清頌〉之下評曰：「大抵華腴害骨，然明遠壯彩，簡文思清，固一時之傑也。」⁵⁶於〈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之下評曰：「開闔動宕，情文相生，儷體之上駟也。」「垂縮激射，文字上乘，開闔跌宕次之，此為開闔跌宕者歟？」「隸事之富，始於士衡（陸

⁴⁹ 同前註，卷 4，頁 1。

⁵⁰ 同前註，卷 11，頁 16。

⁵¹ 同前註，卷 3，頁 6-7。

⁵² 同前註，卷 2，頁 1。

⁵³ 同前註，卷 11，頁 22。

⁵⁴ 同前註，頁 19。

⁵⁵ 同前註，卷 12，頁 15。

⁵⁶ 同前註，卷 2，頁 5。

機)；織詞之縟，始於延之(顏延年)；詞事並繁，極於徐(陵)庾(信)，而皆骨足以載之，初唐諸作，則恐肉之不勝也。」⁵⁷於〈樊孝謙刑罰寬猛對〉云：「閱遠整峻，非唐人所能。」⁵⁸於〈薛元卿隋高祖頌〉之下評曰：「頗得陳古刺今之義，昏虐嗣主，宜乎銜之。」又評曰：「煬帝見而銜之，以為是〈魚藻〉之義。然今尋其託諷之處，亦殊不可得。」又曰：「唐人為之，無此靈緒。」⁵⁹於〈薛元卿老氏碑〉之下評曰：「文字因題而異，亦因所詩而異，意存頌揚，遂泛濫而忘其所歸，是忘題也。為老氏立碑，不詳立碑之意，而詳立碑之人，是忘其所施也。自梁以下，其蔽皆然。駢體之遂為分途，皆自此等為之厲也。」⁶⁰將譚獻對東漢以下文章的評論作一排比，可以看出，譚獻對東漢儷偶情況的出現，雖曰事勢使然，卻仍有幾分不滿。這種儷偶情況代表的是駢文體制的即將成熟，雖然譚獻的不滿不是那麼明顯，然而意在言外，仍不難捕捉。另外，對於齊梁文章雖然也是立足於歷時性的觀察中而有所批評，但卻認為較諸唐人為勝。

以上為對譚獻評點《駢體文鈔》的摘錄。以下是譚獻在《復堂日記》裏的駢散論述，內容多關唐以後文章之批評。基本上認為文章至韓愈以後，每況愈下，多不足取。如云：「閱《毗陵集》二十卷畢。韓愈創為叫囂之文，風尚一變。然會昌以後，正聲不絕，終唐之代，文章師法未盡漓也。至之雅才，又深於玄學，故靜深腴暢。」⁶¹按獨孤及與元結、蕭穎士、李華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前驅，權德輿稱其「立言遺詞，有古風格。辦論裁正，昭德塞違。濬波瀾而去流宕，得菁華而無枝葉」。⁶²《唐實

⁵⁷ 同前註，卷3，頁16-17。

⁵⁸ 同前註，卷10，頁14。

⁵⁹ 同前註，卷2，頁17。按：〈魚藻〉為宗周將隕，詩人歌頌周武王而譏刺周幽王的詩，薛元卿頌高祖所以諷煬帝也，宜乎煬帝心銜之。

⁶⁰ 同前註，卷1，頁13。

⁶¹ 譚獻，《復堂日記·補錄》，卷1，頁215。

⁶² 權德輿，〈故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守常州刺史充本州團練守捉使賜紫金魚袋獨孤公謚議〉，《權載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卷29，頁4175。

錄》即稱韓愈曾學獨孤及之文，譚獻卻以韓愈叫囂之文，無與獨孤，而稱獨孤為文靜深映暢，又「淵靜有法度」，⁶³蓋謂韓愈以前，唐文猶有可觀者。故又於《唐文粹》評之曰：

閱《唐文粹》。文章正脈，視乎取捨。姚氏（北宋姚鉉）亦詞苑功臣，不意朱右、茅坤而後，竟成芻狗，作溝中斷矣。異哉！⁶⁴

按譚獻所云文章正脈者，乃相對於韓愈所立文統而言。他認為姚鉉所選的唐代文章，方是古文的正傳，而不是朱右、茅坤八家系統的韓、柳文，所以感嘆八家行而文章正脈，竟成芻狗，作溝中斷矣。譚獻在驚訝的同時，不屑之意，躍然紙上。又如云：

校《文粹》百卷都畢。唐人文章深厚淵懿，自然入人。言理陳事，往往心得，固自漢魏孳乳，而去齊梁巧構之詞，無天水空行之度。今日偶讀李華〈與外孫書〉、舒元興〈貽從弟砥石命〉，呼兒子指示之，以為今日猶如著蔡也。⁶⁵

這是譚獻對唐代古文的正面評價。譚獻指出唐人文章的特點，與漢魏文章的淵源，以及相較於前之齊梁，後之兩宋，唐人文章的優勝之處，並舉出兩篇為例，為兒子指示門徑。最後則出以諧笑之言，以為《唐文粹》於今日，已是廟堂神龜，被高高供奉了。其言外之旨，仍是如前所言，正脈為芻狗，別子成正宗。譚獻對此情況，幾乎是不能忍受。如批評《新唐書》云：

閱《唐書》。文體闊遠，亦云史才。好用新字更改舊文，多可笑哂。如「師老」為「師耄」、「不忍」為「弗可忍」、「不敢動」為「不敢搖」，直兒童語！宋祈亦雅才，何以有此弊？究其師法，殆退之作俑耳。宋與歐陽皆崇信退之，乃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此中消息，承學者參之。⁶⁶

⁶³ 譚獻，《復堂日記》，卷1，頁3。

⁶⁴ 譚獻，《復堂日記·續錄》，頁358。

⁶⁵ 譚獻，《復堂日記》，卷3，頁59。

⁶⁶ 同前註，卷1，頁14。

觀譚獻之意，宋祈、歐陽修為了讓史傳文字在文氣上有較多的變化，於是改舊詞以新字，卻是讀來多可笑哂，如兒童語。譚獻認為此蓋韓愈始作俑，然歐、宋以文壇巨子而學之，此中顯現的卻是斯文的消息變化，蓋每下愈況也。來看一則相近的評論。譚獻云：

閱《（新）唐書·儒林傳》。不能詳授受淵源、傳著目錄。宋子京本不通經，又不識前史〈儒林傳〉體例，乃至〈陸德明傳〉，未及《經典釋文》，豈非巨謬？〈孔穎達傳〉，不能詳述《正義》所襲六朝諸舊學，然則後世何賴有史哉？⁶⁷

這是以章實齋流略學的眼光批評宋祈《新唐書·儒林傳》的撰著缺失。確實，陸德明為世所知者，在《經典釋文》，而〈陸德明傳〉未能載明；《五經正義》為世詬蔽者，在襲六朝義疏而掩之，而〈孔穎達傳〉不能詳述，亦無怪復堂出語尖刻，乃云「歐蕪宋澀，史家之下乘也」。⁶⁸關於有宋一代學術文章，譚獻向無好言語。如云：

偶檢沈壺子敦《落楓樓稿》，卷二有〈宋神宗用兵西夏論〉，深咎將帥之不得人。予謂從事西夏者，韓、范皆誤國之臣也，何論其他。趙氏一代，武功最衰，虛辭講學，華辭飾治，文法拘牽，必至於此，豈非百代之龜鑑。⁶⁹

如此批判，則是有將有宋一代之衰落，與其學術文章作聯結了。再來看譚獻對蘇軾父子的批評：

閱《何博士備論》。文氣條鬯，讀史亦略見其大。然文士之業耳，何足傳於兵家？有宋之士，文士好多言，蘇氏父子最傳，最無實用。何去非者，蘇氏所賞激，奏進此書，待不以為空言邪？論司馬仲達之不戰欲以困孔明，不為無見；論孫伯符不當拒董卓，則可謂鑿語。⁷⁰

⁶⁷ 譚獻，《復堂日記·補錄》，卷1，頁213。

⁶⁸ 同前註，頁215。

⁶⁹ 譚獻，《復堂日記》，卷6，頁144。

⁷⁰ 同前註，卷4，頁97。

譚獻的評論，看似與文章無關，然三蘇所以享譽士林者，正以其文章耳。譚獻所謂「蘇氏父子最傳」者，不正其文章乎？而以為最無實用者，當然不是指其文章不可讀，而是指其學識見地不切實際。所以，當他看到宋廉能知經傳的文辭關係時，不禁大加贊揚，以為有識。而言：

閱《宋景濂集》。……〈陰陽樞篇〉有云：「孔子之傳《易》，孟子之說《詩》，加以數言而其義炳如也。是何也？辭不必費也。辭之費，其經之離乎？漢儒訓詁經文，使人緣經以釋義，必優柔而自得，其有見乎爾也。近世則不然，傳文或累言數百，學者復求傳中之傳，離經遠矣。其造端者，唐之孔沖遠乎？」先生生宋後，又承金華諸君之學，而能為此言，豈獨一時魁碩哉！⁷¹

按宋廉學承金華一脈，以史學聞世，卻能於經傳關係，有如此深識，是故譚獻不吝給予贊許。需知譚獻「生宋後」之語，反饋出的不只是他對宋以後學者的輕視，同時也反映出宋廉身在元明之際，而能深識義疏學之弊病，所具有的特殊性。譚獻豈獨一時魁碩之語，絕非客套隨性之言，而是喜見前輩同道的驚豔。因為有明一代，文章之道不出八家矩矱，最為譚獻不喜，難有佳評。如言：

閱《史記》。知後世之節字省句以為古者，皆可笑也。歸評《史記》，桐城一派古文家主張之。少遊京師。孫琴西（衣言）、王少鶴（錫振）二公，方從事鉛丹，以為枕祕，予過讀，不甚喜之。已而得見章先生遺書，批寫摧陷，益輕之。三十年來粗明群籍，折衷大誼，乃知震川得史公之膚末，而不可謂無所見。第佔畢點識，何足以教後人？推崇之者，傳寫遺筆，自為師法，不可謂非幸也。⁷²

按歸有光之古文，上承八家，下開桐城，此為文學史的基本常識。又以老於場屋，深通制藝之法，其評《史記》，於段落之間指示作文門徑，最為士子寶貴。然譚獻自少年時即服膺章實齋之學，以圓通變化論史

⁷¹ 同前註，卷1，頁20。

⁷² 同前註，卷5，頁113-114。

意，以此法治《史記》，自不能愜心於在尋行數墨間鍛鍊文法。在數十年歷練之後，視野漸開，明於學術之流變，而後漸能對歸評《史記》作較為中肯的評價。雖以為不無所見，然五色圈點之法，究竟學究氣象。對那些自為師法之人，譚獻也不無嘲諷之意。總之，唐宋派的文章，向非譚獻所究心。至於清初沿明代之習，文章仍有蕪雜之病，時至雍乾，文章仍陷入陳舊老套的格調，乃至桐城立派，使文脈支弱不振，最為譚獻慨然太息。其言曰：

壬申元日，雜陳文籍，得王亮生（王塗）選《國朝文述》，誦三五篇。去取頗不苟，憾其少耳。國初沿前明之派，仍病蕪雜。雍乾以來，溺於白科。至桐城派立，支弱不振，故可讀之文，前則孤立無盛名之士，後則治經有樸學之儒。文章冠古，必先截斷眾流，予有志論定，而未有緒也。⁷³

按王塗所編《國朝文述》，皆從《經世文編》錄出，而稍增入數篇，去取頗為嚴謹。所收如張爾歧（蒿庵）〈袁氏立命說辨〉、董文友（以寧）〈宋太宗論〉、彭秋士（績）〈先府君述亡妻龔氏墳銘〉、管韞山（蓬萊）〈春秋公羊說〉等，李慈銘以為皆佳文，作者在當時卻不以文名。然則有清一代的文章事業，譚獻以為，靠的正是前則孤立無盛名之士，後則治經有樸學之儒以為撐持，所謂「文章冠古，必先截斷眾流」者，就在於能有獨識之見，不必人云亦云。由是觀之，則桐城文章，不入譚氏法眼明矣。故譚氏又言：

閱姚椿《國朝文錄》。多取閱理之文，氣茶詞繁，不無皮傳。春木墨守桐城，而方、劉、姚三家甄錄亦未盡當。近時兩文錄，上高李祖陶囿於帖括，姚選又蕪於理障，皆未饜承學之心也。庶幾其《文徵》乎？⁷⁴

又如：

⁷³ 譚獻，《復堂日記》，卷2，頁51-52。

⁷⁴ 同前註，卷6，頁136。

閱吳翊鳳撰《國朝文徵》，吳氏纂錄不無鄉曲之私，亦有闡幽之意，山林之士取之稍溢，乃有絕無傳本者。枚庵喜抄密冊，說部別集未著人間者往往寫藏。……去取之旨多載潛德獨行，不事門戶，遠勝姚春木、李邁堂之識。⁷⁵

蓋譚獻以姚椿《國朝文錄》墨守桐城、鄙於理障，又於方、劉、姚三家甄錄未必盡當，故評價甚低。而於吳翊鳳《國朝文徵》闡幽山林之士，收錄於草澤之間，能載潛德獨行，又能不事門戶，多所稱許。以為遠在姚、李二家之上。至於李祖陶之選，且觀譚獻之評論：

《國朝文錄》，李祖陶所選，雖囿行墨未拔俗，然持論平實。既排簡齋，亦於望溪有微辭。予定是編在姚春木《文錄》上，吳枚庵《文徵》下。明以來，文學士心光埋沒於場屋殆盡，苟無摧廓之日，則江河日下，天可倚杵。予自知薄植，窮欲主張胡石莊（承諾）、章實齋之書，輔以容甫、定庵，略用挽救，而先以不分駢散為粗跡、為回瀾。八荒寥寥，和者實希，中白（莊棫）、谷成（沈善登）其謂之何？疇人中所可哆口者，惟曰有實有用而已。⁷⁶

按譚獻雖以李選囿於帖括行墨而有微辭，然亦多其能既排袁枚，又不滿於方苞之文，故定其在姚、吳二選本之間。接著譚獻藉由對有明以來文士埋沒於場屋，用心於八股，以評點作文章之態勢，提出反醒。認為若沒有將此一類態廓清，則江河日下，立杵可以倚天。所以他提出一套文章之法以振救之，即是當以胡承諾、章學誠的通識古今之法治學，而表出以汪中、龔自珍哀感頑豔之文，然後以不分駢散為作文之大道正理以挽回局勢。可惜八荒寥寥，和者實希，但他自信在同儕之間可哆口者，就在其文章有實有用而已。

按錢基博云曰：「譚氏論文章以有用為體、有餘為詣、有我為歸，不尚桐城方、姚之論，而主張胡承諾、章學誠之書，輔以容甫、定庵，

⁷⁵ 同前註，卷5，頁119。

⁷⁶ 同前註，卷3，頁58-59。

於綺麗豐縟之中，存簡質清剛之制，取華落實，弗落唐以後窠臼，而先以不分駢散為粗迹、為回瀾。」⁷⁷即是概括譚獻此段文字而又有引申。以譚氏文章不主桐城，而別寓駢散不分之意。然原其制作之方，則又能藉汪容甫、龔定庵雅潔濃鬱之文風，運以胡承諾、章實齋學術之深識。而所謂於綺麗豐縟之中，存簡質清剛之制者，則以東漢魏晉為極則。簡言之，即步武汪容甫、龔定庵也。蓋譚獻於此處，正式提出以駢文振救自有明以來，文壇多主八家之頹風。今觀邵齊燾在〈答王芥子同年書〉中云：「平生於古人文體，嘗竊慕晉宋以來詞章之美，尋觀往制，泛覽前規，皆於綺藻豐縟之中，能存簡直清剛之制，此其所以為貴耳。」⁷⁸亦即認為惟有將此兩概念結合起來，才能體現駢文的特色。此說自邵氏提出之後，便得到時人及後人駢文評價的一致認同，成為後來駢文批評的專門話語。譚獻弟子徐珂以為乾嘉道光作家為清代駢體文家之正宗，其中論邵齊燾言：「（邵氏）規模魏晉，風古高騫，於綺藻豐縟之中，存簡直清剛之制，一時風氣為之大變。」⁷⁹此蓋漢末魏晉駢體初成，散行未退之特色。朱一新即云：「文章關乎運會，東漢清剛簡直，適如東京風尚。建安藻繪而雄俊，魏武偏霸，才力自與六代不同。」⁸⁰而在譚獻看來，有清一代，以汪中、龔自珍之文最得魏晉遺意，故推此二人以為代表。當然，汪中、龔自珍二人還有一重身分，即是治經之儒，譚獻所謂「經生托體魏晉而下」⁸¹者以此。換言之，在譚獻心目中，好的文章家須有胡承諾、章實齋之通識，汪容甫、龔定庵之豔才，然後駢散不分，撰為有實有用之文。在此文章觀點之下，桐城一派排斥駢體的主張，就不能為譚獻所接受。如言：

⁷⁷ 錢基博，〈序〉，《復堂日記》，頁 5-6。

⁷⁸ 邵齊燾，《玉芝堂文集》卷五，《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集部第 281 冊，頁 504。

⁷⁹ 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3889。

⁸⁰ 朱一新，《無邪堂答問》（臺北：世界書局，1963），卷 2，頁 51。

⁸¹ 譚獻，〈駢體文林序〉，收入朱又笏《駢體文林》（浙江大學圖書館藏手稿本），卷首。按：朱又笏之書，譚獻在《日記》中作《駢儷文林》。

長沙王祭酒益吾選刻《續古文辭類纂》卅四卷，閱一過。往年不樂五子八家之說，故日記有談學術一篇，未及桐城家數，若以近世學人所見，必以不佞為持摭星宿、遺義娥矣。少交袁鳳桐敬民，嚴事邵位西丈，入都以後，朱伯韓、王少奎、孫琴西、馮魯川諸先生，皆附文遊之末，諸君固學宋儒之學，傳桐城之文，予亦究心方、姚二集，私心有所折衷，不苟同亦不立異也。⁸²

按譚獻在另一處《日記》中曾記載：「購得王翰林先謙選刻《續古文辭類纂》。意主桐城，去取頗矜慎也。」⁸³這一段文字可以說是他對桐城態度的清楚宣示，晚清文人不曾與桐城有接觸者蓋鮮，譚獻師友長輩多學宋儒之學，傳桐城之文，譚獻自己也曾究心於方苞、姚鼐之文，但他最終沒有歸宗桐城門下，而是折衷之後，不苟同不立異，原因是他已有清楚的文章意識了。來看一段文字：

閱姚惜抱、紀曉嵐文。李氏不滿桐城，於惜抱尤刺其虛鋒，所錄不得姚氏妙遠之旨，而力詆其碑誌，欲以紀尚書凌駕之，實非公論。尚書記誦之學，敘事雖磊落使氣，而未離說部，故條暢有餘，閱深不足，未能與人爭衡。予亦目笑桐城，而姚比部有道之詞，雖約而不闕，亦言之成理，高者有逢原自得之趣，正未可以鉅釘吏牘之見繩之也。⁸⁴

這是對李祖陶選錄姚鼐、紀昀文章偏頗之處的評論，他認為李祖陶因不滿桐城，尤其諷刺姚鼐文章有如辯士之虛鋒，所錄並未能得姚氏妙遠之旨，又力詆其碑誌而欲代之以紀曉嵐之文章。譚獻乃作持平之論，認為紀昀文章未離說部，故條暢有餘，閱深不足，實不必與人爭勝負場。雖然譚獻自己也常嘲諷桐城文章，但是姚鼐的有道之詞，即使不夠闕闊，亦言之成理，高者有觸處自得之趣，不可以雜湊堆砌的公文視之。最後來看譚獻一段感慨：

⁸² 譚獻，《復堂日記》，卷6，頁139。

⁸³ 譚獻，《復堂日記·補錄》，卷2，頁304。

⁸⁴ 同前註，頁286。

吾輩文字不分駢散，不能就當世古文家範圍，亦未必有意決此藩籬也。不謂三十年來幾成風氣。約略數之，如謝枚如、楊聽臚、莊仲求、莊中白、郭晚香、孫彥清、褚叔寅、樊雲門、袁爽秋、諸遜菊皆素交，新知則有朱右笏、范仲林，近日始見蔡仲吹、王子裳之作，所造不同，皆是物也。至趙桐孫、張玉珊、沈蒙叔、張子虞、許竹簣、李亞白、鄧石瞿則主儷體，吳子珍、高昭伯、王子莊、董振軒、方存之、方滌齊、蕭敬夫、顧子鵬、朱莘潛則主單行，殆未易通彼我之懷矣。⁸⁵

譚獻細數文壇之變化，認為文字不分駢散，不入當世古文家方圓，亦不刻意壁壘相對的主張，三十年來幾成風氣。新知故交有十數人，皆持駢散不分之態度，卻也有不少專主儷體、散行之人，譚獻認為此輩殆未易通彼我之懷，蓋未以同道視之也。

四、結論

在譚獻看來，清初至乾隆初葉，是一代學術最黯淡的時刻。學者雖厭前輩學術鄙倍，能搜討墳籍，卻因學無塗徑，只博得淹雅之名。譚獻所謂：「儒林、文苑，兩無所歸，承學之士，文采黯然矣。」⁸⁶然否中見泰，此事物之理，學術之興起，亦賴有淹博為累積。故譚獻言：「惠氏一門，即於是萌芽經術，故餽釘菟瑣之習漸衰，而六藝古學起矣。極盛于乾隆季年，益精於嘉慶，遺經耑序皆有條目，六書九數如日中天，於是乎有清之學，跨越千載，由唐以來，不愧儒林之傳者，惟今日耳。」同時，表現經學的文章亦有可觀。他說：「以文辭言，乾嘉時，經生文士實有澹雅醇古，抗顏行於先秦兩漢，朱右、茅坤以來，十家八家之燄

⁸⁵ 譚獻，《復堂日記》，卷8，頁192。

⁸⁶ 同前註，卷1，頁18。

亦以稍燿，則必非百年以前所敢望矣。」⁸⁷從這兩則評論看得出來，譚獻對由惠氏開其端緒，興盛於乾嘉時代的治經之業給予了頗高的評價；對當時經學家的文章，亦是擊節贊賞；而對古文選本之學，頗有鄙薄之意。對清代文學史稍有涉獵之人皆知，乾嘉文壇有尖銳的駢散之爭，表面上是擡高漢、魏駢文，貶斥唐宋八家及桐城派古文，其實還隱含有一層文章所承載（漢宋）學問優劣之意識在內。譚獻「必非百年以前所敢望」的感慨，隱約含有漢學壓倒宋學的慶幸之意。顯然，在漢宋立場上，譚獻旗幟鮮明的站在漢學家這一邊。同時，亦可謂其學術所尚，是定格在乾嘉時期的經術文章之上。這是譚獻對文章的最高禮贊，也是譚獻認為文章該有的風貌。可惜朱右、茅坤等十家八家的唐宋文選本，一直主導文壇，直到晚清，仍是譚獻討論文章的時候，無法迴避的他者。但我仍可以從譚獻的論述中，看到他為文章事業的努力。雖然事異時遷，文章之道於今講究者少矣，然而乾嘉諸儒經術文章相結合的完美演繹，對吾人而言，或不只是一段經學史、一段文學史而已，講論學問，煥乎有文，亦當為今日承學之士，所應究心者焉。

⁸⁷ 同前註，卷1，頁19。

**Articles Concerned with Confucian Academics:
The arguments of parallel prose and prose
from Tan Xian's works**

Chang-Lin Cai*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an Xian's attitudes towards parallel prose and prose and reveal his viewpoints hidden in these attitudes.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s, it was the mainstream argument not to distinguish parallel prose from prose when talking about articles, just as to mingle Han learning with Song learning when discussing academics,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actually a general opinion, whose nuanced distinctions should be differentiated and analyzed through great efforts. On the one hand, Tan Xian constructed a new pedigree of Han learning so as to compete for academic orthodox with those scholars belonging to Han learning. On the other, he didn't distinguish parallel prose from prose when making reference to articles, intending to compete for literature orthodox with ancient prose writers. Tan's attitudes towards articles was close to those of ancient prose writers, and he insisted that articles should have the function of spreading Confucian principles and instructions. However, as for these principles and instructions, Tan preferred the basic rites and institutions and the great manufactures and works remained with Confucian classics during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rather than the ethical preaching and moral lecturing given by the Neo-Confucians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and in the same breath, the articles in his mind were referred to those written by Western Han authors, which combined parallel prose and prose, not to those written by the authors after Han Yu in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which had just a single style of prose. Tan

*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believed that articles and Confucian academics were connected closely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quality of articles was equivalent with the quality of a certain academics. Based on this standpoint, Tan made various comments on the articles since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Keywords: Tan Xian, parallel prose, prose, article, Confucian academics

